

〔丹麦〕勃兰克斯 著

#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三分册

## 法国的反动

张道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我踌躇不前，  
就是给了我生命  
我也不能存留在人间，  
正如您能理解的那样  
当您看见人们如何表现。

——歌 德

如果对后果的恐惧强于对真理的热爱，  
就不可能产生哲学。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 引 言

在十九世纪初,有许多人物、行动、情绪、心情、想法和作品形成一个集合体,出现在法国,以法语表现出来,并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个自然结合起来的集团,因为他们都环绕一个想法,即重建一个被打倒的势力。这个被打倒的势力就是权威原则。

所谓权威原则,照我的理解,就是那个认为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应当建立在对世袭传统的尊敬之上的原则。

权威的本质就是权力,它具有这个权力不是基于什么理由,而是由于它本身的存在,它是人的头脑对现存状况自愿或非自愿服从的结果。权威原来只有两个手段供它使用;那就是强迫和恫吓,这是它始终要保有并加以使用的手段;不过在早期它却没法唤起尊敬和感激这样的感情。当人们从它那里感到受有恩惠时,他们依靠权威就不会引以为耻或引以为苦了。家庭内的权威,社会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威(长期以来它和专横统治者的意志是同义语)逐步取得统治地位,并一致依靠一个更高权威来支持,那就是宗教权威。在这里,权威原则达到绝对的程度。万能上帝的意志成了最高法律,人人对它都要顶礼膜拜,都要盲目服从。

权威原则曾经对人类起过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但它的真正使命却是使自己变为多余。在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服从法律,因为它由权威产生;在比较高级的阶段,人们服从它是由于认识到它的合理性。在权威变得绝对的地方,它必然要求、事实上也确实要求

人们承认它是一种神秘和神奇的东西,并把一切批评当做是叛逆和异端邪说。

正是由于得到宗教的肯定,权威才变得绝对起来。不过,由于基督教在欧洲发展的方式,权威原则在这个大洲还没有以其最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基督教(至少在公开场合)曾宣布自己是仁爱的宗教,是基督的宗教。历史表明,教会实际上最强调的是相信基督教的教条,相信有义务服从超自然的权威——对它和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必然不是仁爱,而是服从。不过到现在为止,连最严谨的神学家、教士和宗教作家都使用过宗教热情的语言,在宣讲信仰理论的同时也宣讲过仁爱的道理,设法不仅要促进权威的目的,还要赢得灵魂。直到许多国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把自己的头脑从超自然领域的权威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对它采取了批判态度,人们在为单纯的赤裸裸的权威原则辩解时才采取不动感情的方式,所用的论据才经常地只是诉诸理智,不过偶尔也还诉诸想象力。

在教会和国家,在社会和家庭,甚至在人类认识的领域里,都可以把权威原则作为知识和智慧的原则加以鼓吹。在我准备描绘其精神生活的这个时期,它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鼓吹的,但现在提到的这个时候,它在各个领域都被打倒了。

为了理解它如何被复活、宣布、发展、辩护、确立以及最后又被打倒,我们有必要看看在革命时期它是怎样被废除,又是借助什么基本原则被废除的。

它并不是同时各个领域受到攻击的;不过很明显,它在各个领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在宗教领域的存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最高的领域。因为正是教会作为权威赋予其他一切生活领域以权威——赋予“受天恩的国王”,赋予作为圣礼的婚姻,等等等等。

因此,一般说来,权威原则随着教会权威的兴衰而兴衰。当教会的权威被破坏时,所有其他权威也会跟着一起垮台。

不是说哪个在十八世纪为了把思想从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比任何别人都干得起劲干得成功的那个人，曾预见他的劳动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不是这样的！伏尔泰没有希望外部的革命。在他的小故事《世界现状》中，贤明的巴布开始时对佩瑟波利这座大城市腐败的情况是极为反感的，后来却逐渐看到这种坏的状况也有好的一面；当这座城市的命运取决于他对天使伊蒂里埃尔的报告时，他宣布自己完全反对把它毁灭掉。就连天使最后也没有想对佩瑟波利的习俗作任何改变，因为“虽说情况不佳，倒也不是无法忍受。”这样一种思路很难称得上是革命的思路，而伏尔泰的看法至少有时候是和巴布一致的。他一向是向国君而不是向人民呼吁，请求把他的想法变为行动，他常常宣称国王和哲学家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当霍尔巴赫<sup>①</sup>和他的合作者断言“在这些承受天恩的统治者，这些上帝的代表中，一千年也难于有一个人具有最普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或是最一般的才能和品德”时，伏尔泰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也包含了对《自然体系》猛烈的愤怒的抨击。他不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信徒，也不同意它的这些结论。

尽管如此，毕竟是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这两位伟大人物设想的东西，革命使之实现了；它是他们意志的执行人，个人自由的思想变成了破坏性的行动，互相依靠的感情变成了起团结作用的东西。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他们的热情。

---

<sup>①</sup> 霍尔巴赫(Faul Henri d'Holbach, 1723—1789),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及无神论者,《自然体系》的作者。

## 目 录

引言 .....	1
一 革命 .....	1
二 与教皇的协议 .....	30
三 权威原则 .....	47
四 《基督教的真谛》 .....	66
五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 .....	74
六 博纳尔 .....	98
七 夏多布里昂 .....	117
八 克吕德内夫人 .....	148
九 抒情诗：拉马丁和雨果 .....	177
十 这个时期文艺中表现的爱情 .....	200
十一 理论上的权威原则的解体 .....	217
十二 实践上的权威原则的解体 .....	229
十三 反动的顶峰和崩溃 .....	247
十四 结束语 .....	265

## 一 革 命

权威从一开始在本质上就是与僧侣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因此要理解后来思想界发生的反动运动，就必须了解法国革命对教会和宗教态度的发展和变化。既然反动意味着重建权威原则，它自然要从恢复教会开始，这是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法国革命具有的宗教性质不亚于它的政治性质。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十八世纪自由思想哲学家们劳动的实际成果。正是由于 1789 年的革命，人类思想才取得了战胜偏见和权势的最大战果——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人类得到这一无可估量的恩赐，肯定不能归功于基督教教会，因为它对一切与此稍微沾边的要求都是极端反对的。

在革命开始时，以权威原则为一方，以尊重个人和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原则为另一方，一场大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完成。要参加这场厮杀的领袖们、武士们和地主乡绅们，都已各就各位。暂时他们还互不相识，也不为世人所熟悉，但不久他们的名字将在世上传开。这些人的出身门第和历史都各不相同。他们中间有米拉波这样的贵族，莫雷、福谢和塔勒朗这样的教士，马拉这样的医生，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律师，还有 M. J. 谢尼埃、孔多尔塞、丹东和代穆兰这样的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和作家——这是一大批有才能、有个性的人。教会纠集了它的一切势力来做拼死的斗争，但却注定要被击败。革命不断前进，先是犹犹豫豫，接着是咄咄逼人，然后变得不可抗拒，最后便陶醉在胜利之中。随着三级会议的召

开,比武场打开了,互相提出了挑战;历史,这个伟大的裁判,发出了角斗开始的信号。

三级会议一召开,教士们提出的第一个众口一词的要求就是要人们承认“信奉教皇的罗马天主教”为国教,由它来垄断全部公众信仰。地位较低的教士中间有许多人属于共和派,但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并不包括宗教自由。思想开明的教士们可能激昂慷慨地攻击宗教法庭,把它比作吃人的虎狼,但他们都反对宗教宽容。革命的神父福谢在攻下巴士底监狱之后赞美过市民战士的三色制服,并把三色旗定为国旗,现在却嘲笑宗教宽容的想法,预言这样做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普遍彻底的道德败坏。他甚至主张不参加教会的人无权结婚,“因为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人会信守诺言。”

当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时,教士很快被迫做出了让步;但即使反教士的情绪开始露头,它最后也都是以最温和最恭敬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例如1790年2月,当加拉宣称有一个公民出家当教士就无异于有一个公民自杀时,许多教士(其中包括莫里神父,南希和克莱蒙的主教),便大为恼怒,指责加拉是亵渎宗教,并提议宣布天主教为国教。这个提案虽被否决,但否决的方式却清楚地表明它的反对者是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否决的理由是:如果对这样一个问题还表现出什么疑虑,那简直是对宗教的侮辱,也是对整个议会的感情的侮辱。那时人们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这个议会,尽管其大部分成员都是自由思想家,却参加教会的仪仗行列,参加天主教的公众礼拜。仅仅两个月之后,定天主教为国教的动议又提了出来,这次是在莫里针对把教会财产移作俗用的提案作了长篇激烈的发言之后提出来的。提出这项动议的人这次是一位教士名叫东·盖勒(他后来成了一名雅各宾党的成员,对他这第一次公开露面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曾竭力加以洗刷)。米拉波当时指着从他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的卢浮宫的一扇窗子高声回答说:“就从这个窗口,一个把世俗目的和宗教的精神目的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专制君主开了第一枪，发出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信号。”但议会再一次回避解决这一问题，声称宗教的尊严和人们对它的尊重不允许把这作为辩论的议题。左派人士一致没有投票表态；有二百九十七名成员，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四名教士，签署了一份抗议书。摇摆不定和自相矛盾是当时的特点。

那些贵族阶级人士，他们一百年前曾为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sup>①</sup>欢呼，现在却受十八世纪文学影响到这种程度，以致作为三个等级的一个方面，竟以真正的伏尔泰精神宣布赞成普遍宽容；但他们同时又吞吞吐吐地表示天主教应当定为国教。至于第三等级，即市民们，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詹森派教徒，其思想实际上不那么自由化，他们也持同样躲躲闪闪的态度。但一等国民议会正式成立，就不再有什么真正的犹豫不决了。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议会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通过了《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宗教方面的思想及言论自由正是人的一项权利。宣言第十条写道：“任何人不得因所持见解，即使是有关宗教的见解，而受到干扰，只要表示上述见解不致破坏法律秩序。”对此教皇做出了回答，他说这种自由是“邪恶的，愚蠢的权利，只会破坏人的理性”（原文如此）。这充分表明了两个阵营的相对立场。

当宗教宽容成为国民议会辩论的议题时，我们便可感觉出形势发展的方向。在《人权宣言》第一稿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公众礼拜既是一件大事，社会即有权加以控制，有权允许某一教会的礼拜活动，而禁止另一教会的这种活动。”对此，米拉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维护的并不是宗教宽容，”他说，“在宗教方面，在我看来，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神圣的权利，用宽容两个字来表示它，本身

---

<sup>①</sup> 南特法令原为亨利四世于1598年所颁发，给予法国新教徒以信仰自由，后被路易十四撤销。

就有暴政的味道。如果存在一个权威,有权力去宽容,自然也就有权力不去宽容,这就是对思想自由的侵犯。”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更前进了一步。他说道:“有人谈到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这里‘占统治地位’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这个词,必须请人给下一个定义。它是否意味着一种宗教可以压制别的宗教?国民议会不是禁止使用压制这个词吗?它是指国王的宗教吗?国王可没有权力统治人的良心或指挥他们的思想。它是指大多数人的宗教吗?宗教可是一个看法问题。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就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宗教。思想不是靠计算票数来形成的。思想是人自己的,是独立的,是无法限制的。”

显然,人们开始有了勇气来发表宗教方面的看法。

我还想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议会内部和整个社会上,人们以多么快的步伐由开始的胆怯和恐惧走向坚定不移: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开始了。

1789年10月,一批衣着古怪、东方脸型的人作为代表出现在议会大厅里。他们是从阿尔萨斯和洛林来的犹太人,被他们的教友们选作代表,来请求对他们的宽容。

他们说道:“最崇高的议员先生们,我们以主的名义(他是正义和真理的源泉),以上帝的名义(他给了一切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职责),以人道的名义(多少世纪以来这种人道的精神一直在受着损害,因为一个最古老民族的不幸后代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谦卑地要求你们考虑我们不幸的命运。这些犹太人,到处受迫害,到处受屈辱,却从来都很温顺,从不做任何反抗;这些犹太人受到一切民族的鄙视和折磨,他们应当受到怜恤和宽容——他们现在跪倒在你们脚前,斗胆希望诸位在处理许多重要任务的同时,不要忽视和鄙弃他们的申诉,而能怀着同情之心倾听一下他们从所陷入的苦难深处发出的怯懦的抗议。……愿我们的处境能有所改善,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现

在我们含着眼泪，恳求诸位加以考虑，发一发慈悲！”

这次请愿得到克莱蒙·通内尔的热情支持，但蛮横无情的莫里神父却起来反对，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讲迫害和不容忍是可笑的！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但是，允许犹太人成为公民，就等于让英国人或是丹麦人不办理归化手续，不停止英国或丹麦国籍，便成为法国人。”他还详细地谈了犹太人放高利贷成性和人们指责他们干的其他坏事。“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亲手扶过一张犁，耕过一块地。”

考虑到犹太人被严禁占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考虑到他们的地位是那样低下，以至于每当他们进入一座城市时，当局都要像对猪羊征税一样对他们征收入市税，莫里的论点是不难驳倒的。但当时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还那样强烈，没有人起来反对他的话。人们担心如果给予犹太人以公民权，他们会使整个阿尔萨斯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会场上普遍呈现一种尴尬情绪。只有一位当时尚未引人注目的议员马克西米利昂·罗伯斯庇尔发言主张给犹太人以平等地位。他说，犹太人干坏事，是他们被迫处于低下地位的结果。

而他是一项办法的唯一支持者，这办法很有意思，就是把新教徒、演员和犹太人归入一类。新教徒和演员的人权得到了承认。但是米拉波认识到不可能通过动议中有关犹太人的这一条，便无限期地停止了关于这一条款的辩论。两年过去了。1791年犹太人再次呼吁。但这次的口吻却大不相同了！奴隶式谦卑的恳求变成了人的命令式的要求。呼吁书的结尾如下：

“如果有一种宗教使其信奉者不能成为公民，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奉者却都成了好公民，那么这些其他宗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没有的，因为一切宗教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不给他们以公民权，那他们就是由于生而信奉某一宗教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没有宗

教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伴随着公民权而丧失。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促使人类向宗教自由前进的同时,原来是希望他们也向公民自由前进的;半截子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像不存在半截子的正义一样。”

在革命气氛中度过的两年,不仅使这些贱民获得了自尊,而且获得了自豪感。这一次,这项措施未经辩论就通过了。

“哲学家们”给这个时代灌输的仇恨独断宗教<sup>①</sup>及其教士的情绪,在国民议会里没有表现在言论上,到那时为止,它完全表现在行动上。教会的一切财产都被宣布为国家财产。伏尔泰让他的追随者牢记“消除那种可耻现象”(écraser l'infame)是他们的职责。忠诚的天主教徒从议会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人们正在企图实现这项指示。在他们看来,仿佛地狱里的一切力量都被释放出来向教会进攻,就仿佛“哲学家们一心要消灭基督教,不仅是法国的,而且是全欧洲、全世界的天主教”(见1792年出版的《反天主教和反君主的阴谋》)。为了取得这项成果,“哲学家们”曾向大国的国王呼吁,向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卡萨琳以及其他国家呼吁,但打击却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

教士们,正如俗话说,找到了阿基米德<sup>②</sup>所谋求的,从另一个世界找到支点来推动这个世界,他们开始在外省煽动宗教狂热。在阿拉镇,人们抬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巨画游行,在画里,莫里和保皇党人站在十字架的右边,革命派的人站在左边,站在那个死不悔改的窃贼下面。在尼姆,当新教徒圣·埃蒂安纳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的消息传来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暴乱。

教会事务的变革是由议会中伏尔泰派和詹森派议员联盟促成的。詹森派从宗教上厌恶世俗的荣华富贵,作为宿命论者,他们确

---

① 独断宗教(Positive religion),指基督教,特别指天主教。

②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叙拉古著名数学家,曾发现阿基米德原理。

信人间存在着苦难。因此,他们看到教会富有,就十分不满,但没有看到穷人从教会财产中也得到一些好处。此外,许多上层教士过的可耻生活引起了他们的义愤。比如,人人都知道,雅朗特主教的情妇基玛尔小姐在歌剧院后台分配教会的职位,纳尔博纳大主教在他下属的一个寺院中有一大批妻妾,还有格朗赛尔夫修道院的僧侣们在邻近的村子里有他们情妇的住所,在那里每天晚上都大摆筵席,寻欢作乐。

如果革命派仅仅满足于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被扣上攻击教会的罪名。但他们还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和教规,甚至改变它的宗教仪式;因此,教会的要人们自然大声疾呼,宗教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样一来,一般教士简直不敢宣誓效忠宪法。那些宣了誓的人每年可从国家领到少量的津贴,这笔钱往往被比作犹大的血钱,而过去主教们拥有自己的宫殿和娱乐场、享受一切奢侈品,下层的教士们简直是在忍饥挨饿的那种情况反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新局面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外省发生了许多骚乱和滑稽可笑的场面。在卡米尔·代穆兰给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找到一段关于强迫一个乡下神父和他教区分手的有趣的描述:村子里的一位神父先生做完弥撒,从教堂门口出来,惊奇地看见一辆马车满载着他所有的东西,车顶上坐着他的女管家雅沃特,小学教员正含着眼泪和她告别。神父在一片“尊敬的神父先生,再见,再见!”的叫声中,被推上马车,他不得不离开这里,尽管他大吵大闹直到他教堂的尖顶看不见时为止。在另外一些地方,教士在枪口对准胸膛的情况下被迫宣誓,有一次一个倔强的人在布道坛上就给人开枪打死了。但如果说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偶尔受到粗暴的对待的话,这些教士们对待他们对手的态度则更要坏到不知多少倍。他们向农民说,新宪法(这部宪法其实丝毫没有干预宗教)是魔鬼定出来的。他们让到教堂来的人们相信:从一个宣誓效忠政府的教

士手上领圣餐是一项不可饶恕的大罪；由这样的教士主持婚礼的人，他们的孩子是不合法的，甚至将受到上帝的诅咒。一个宣过誓的教士在教堂里被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另一个被吊死在神坛的挂灯上。奉国民议会之命关闭的教堂被强行重新打开。在某些地区，一群群杀气腾腾的信徒们在教士的带领下，手执火枪和长矛到处巡逻。布里塔尼的情况最糟。有一个农民跑了好多里路，去听一个真正的即没有宣誓效忠宪法的教士做弥撒，回来时看到十来个邻居从他们自己地区的教堂出来，他们刚刚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一位由政府委派的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看到这种情景，那个农民是那样愤怒，感到有理由采取教会怂恿他干的任何残暴行动。

到立法会议召开时，就不再有什么三级了。贵族已逃亡在外，流亡的教会要人正在向外国宫廷乞求援助。下层的教士们在反对革命的狂热情绪驱使下，正在鼓动愚昧的群众。国民议会此时进行的辩论和过去那些辩论口气完全不同了。现在对宗教经常的指责就是一句简括的话，它和宪法不协调；对教士们的指责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恢复教会的财产。教士们的谎言和暴力行动激起了对他们的强烈仇恨。也可以听到少数调和的声音，例如安德烈·舍尼埃坚持认为，只要国家不干涉教士，教士们也不会给国家找麻烦；又如塔勒朗坚持说，既然法律没有规定要信仰哪一种宗教，那么法律也不应禁止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但是伏尔泰式的愤怒则是当时长期的统治情绪。

这是吉伦德派得意的日子，吉伦德派是伏尔泰思想的实际体现者。

在他们的著名领袖韦尼奥<sup>①</sup>草拟的宣言中，我们读到下面一段话：“反抗的教士们正在准备一场反对宪法的暴乱。这些专制主

---

<sup>①</sup> 韦尼奥(Pierre Victorien Vergniaud, 1753—1793), 法国革命家, 法国革命时期著名演说家。

义的目空一切的忠实信徒正在向欧洲所有的国君乞求金钱和士兵,好用来重新取得对法国的统治权。”内政部长罗兰说道:“叛乱的伪善的教士们用宗教神圣的面纱,掩盖他们的阴谋和欲望,毫不犹豫地鼓动狂热情绪,用不宽容异教这把利刃武装那些被引入歧途的公民们。”在大家讨论驱逐教士的提案时,韦尼奥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别的国家从而给他们带来灾祸,那是不公正的。他强调说:“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把自己想摆脱的罪犯送往别的国家,是最不道德的事。”但他转过来又安慰自己,认为他们在意大利会像圣徒那样受到欢迎,“从我们送去的这批活圣者的礼物中,教皇会看到我们是在对他许多世纪以来为了我们的虔诚信仰而惠赠我们的那些死圣者的胳膊、大腿或其他圣物,聊表我们的感激之情。”

“是的,”伊斯纳尔这位未来的国民大会主席说道,“让我们把这些瘟疫缠身的家伙送到意大利的医院里去治疗吧。”他还说,当一个教士堕落时,他绝不是部分地堕落,而总是彻底地堕落;宽恕罪恶和犯罪没有差别;目前的状态必须结束;是革命的敌人自己迫使革命去摧毁他们。从他的嘴里第一次说出了以后将无数次重复的可怕词句:“不需要证据。”这就是说,所有遭到控告的教士将立即驱逐出境。

当有人表示担心这样行事会引起内战时,著名的吉伦德党人、霍尔巴赫的信徒加代做了一席让大会宽心的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武断的话:“谁都知道教士的胆怯不下于他们的贪婪,他们只会以迷信为武器,只会神学竞技场上逞能;在战场上,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不久将可看到,加代及其同情者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多么的错误,在随即到来的血腥内战中,教士成了多么勇敢狂热的领导人。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地步,当发言人不得不向大会谈及有关教会事务时,往往得先为自己辩解一番。弗朗苏瓦·德·南特(注意,

他是一个委员会的发言人)说道：“我们不得不占用大家一些时间来讨论教会的事，我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诸位将采取的措施会使大家此后没有必要再来听这些事。”他的整个发言是很放肆的。

这种情绪是上层下层所共有的。路易十六的一名大臣，那个傲慢专横的加依埃·德·盖维尔有一天离开会议厅时，向他的同僚莫勒维尔讲了几句话，后者在回忆录中把它们记了下来：“但愿我能把各国的教士——这些可恶的寄生虫放在我的手指之间，好一下把他们捏死。”但革命派的精神，却在一位妇女受委托起草的共和国致教皇的信件中以比较温和而又庄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封信是写给“罗马的主教兼公国君主”的。罗兰夫人以共和国的名义写道：“罗马教会的最高教士，一个正在失去控制的国家的君主，你知道保全国家和教会的唯一可能办法就是破除私心，承认并宣布那些具有最纯真的民主精神、最深厚的人道主义、最完美的平等思想的福音原则，然而，基督的代表却只是为了支持和加强一个由于老朽而摇摇欲坠的君权，才用那些原则来给自己作点缀。愚昧无知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过，这种语言和一般人说话或写的语言是很不协调的。平静的满怀信念的时代结束了，由狂放不羁的感情所支配的时代开始了。跟着信念产生了热情。对天主教的仇恨达到了高潮，爆发成一场遍及整个法国的熊熊大火。这是各个社团的黄金时代。

科岱利埃社<sup>①</sup>在一个寺院的神殿里开会。所有的绘画，壁毯和雕刻品都给扯了下来，只剩下教堂的空架子。主席的座位就设在圣坛上，雨水穿过东边窗口的破玻璃刮了进来。他的桌子是由与会者的长凳构成的，上面摆着一排红帽子，谁想发言就得带上一顶帽子。他身后是一座自由女神的雕像，手中拿着被砸破的刑具。

---

① “科岱利埃社”是法国革命时期丹东、代穆兰、马拉等人组织的一个政治团体，因其最初社址为科岱利埃（即圣芳济修道会）寺院而得名。



木板、残缺的长排坐椅和板凳就是听众的座位，这些人肮脏粗野，身穿褴褛的上衣，扛着长矛，或是把裸露的双臂交叉搁在胸前。演说的人讲得大胆而中肯；一切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一句下流的话或是一个大胆的手势都会引起掌声。他们的话经常被对手、有时被小猫头鹰吱吱的叫声所打断。这些小猫头鹰从寺院屋顶下面的巢穴里被赶了出来，此时从破窗口飞进飞出地寻觅食物。这些家伙尽管主席摇铃也静不下来，有时给人用枪打死了，扑动着翅膀、流着血掉在人群当中。发言人当中有丹东、马拉和卡米尔·代穆兰——那位和葛可亲的会说俏皮话的卡米尔，由于态度温和，被人们扣上伪善的帽子，即使在革命法庭面前，他都谈着耶稣这个“无套裤党人”。不过从个人角度来说，卡米尔有理由仇恨教士。1790年12月，当他想与他喜欢的革命派中无疑最纯洁最漂亮的女性吕西尔结婚时，竟没有一个教士肯为他们主持婚礼，因为他在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说穆罕默德的宗教和耶稣的宗教同样可以理解。他不得不收回这一说法，并去作一番忏悔，才得以结婚。但现在他悔悟了。在他的报纸《老科岱利埃社社员》上，他写道：“既然有人说，各个教派和各派教士都差不多，都同样荒谬可笑，既然有人举例，说鞑靼人把大喇嘛的粪便当做珍馐美味来吃，那么教士和教派这整个问题就都解决了。没有一个傻瓜会傻到当朱庇特的同等人而不感到荣幸。蒙古人崇奉母牛，对它跪拜的人和礼拜古埃及神牛的人一样多……我们没有权力为这些愚昧行为感到恼火，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就天真地确信，可以把一个神吞吃掉，就像吞吃一个牡蛎一样。”在科岱利埃社社员当中，影响很大、发行很广的一份报纸是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在它1792年四旬斋期间出的一期上，刊登了下面一段有关集市表演的激烈的话：“在法国由一个宗教统治的时代，在复活节前的这一周，只有剃发出家的魔术师独家表演，不允许谁与他们竞争。现在却可以自由竞争了。一个普通的变戏法的人登上台时，他穿一件袍子，戴一顶奇特的帽子，把他和